

是一種智慧型處理與查尋知識紀錄的方式，一種可以提升圖書館從業者「處理」與「查尋」知識紀錄兩大專業能力的方式。

當超級媒體走入圖書館之後，圖書館大門口把關的目錄，型態將有所改變，它不再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遠遠立在一旁，遙遙指示著館藏資料的位置，它將與所描述的資料串連起來，統統成為知識整體，或者說超級媒體的一部分，它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熱心的指導者，讀者依循線索而查得的，不僅是書目資料，還有作品本身。電腦來臨之後，書目查尋的命中率提高了，超級媒體來臨之後，資料的運用將更為便捷。在館方的管制之下，讀者在查尋過程中，甚至可以逕加「眉批」、「注釋」，或評論文字，參與創作。圖書館從業者自此在界定蒐集、處理、提供服務等主要任務時，範圍必須更擴大，他們還可以担任「超級媒體工程師」，或者將線性資料換為超級媒體(尤其是無版權的作品)，或者將各超級文案串連在一起，這時圖書館勢必更倚重主題分析与索引專家，因為製作、測試、檢討超級媒體中的串連關係，皆是無比重要的工作。

新科技提供圖書館扮演新角色的機會。對於無版權的作品、圖書館大可將其轉換為光學媒體(現階段)或超級媒體(未來)，無論就資料保存或傳佈的觀點而言，「出版者」都是一個相當有意義而且相當有潛力的角色。再者，當超級媒體在圖書館中漸成氣候之際，圖書館仿倣OCLC、RLG等大型書目供應中心的作法，成為(超級媒體)資訊供應中心，也不無可能。

結語

縱然我們身處於「不連續的時代」、未來的變化不能完全根據過去的經驗加以臆測，然回顧主題查尋的觀念，從分類法、標題法到主題用語典(thesaurus)的過程，一步步由線性的方式，過渡到靈活組合的方式，再推想超級媒體取代部分線性作品的說法，也許並非妄言。

再放眼地球資源，書籍紙張之所來自——森林，果真如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造物者的無盡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嗎？圖書館中脆黃的斷簡殘篇俯拾即是，魯魚豕亥又豈是以保存知識為職志的圖書館從業者所樂見？因此，在書籍之外，另一些生命期更長、功能更多的媒體被開發出來，也是恰如其時。

認識過去，使我們更有靈感與勇氣去面臨未來。圖書館保有人類過去的記憶，同時應用最新科技來提供服務，正是鼓勵我們放眼未來，心懷傳統的最佳媒介，因此，面對迫促的科技脚步，圖書館從業者何妨大胆假設，小心評估，尋求適合的產品，並加以應用，而不失其時，相信對

1.海明威寫「老人與海」時，是否修改了39次？

2.有關茱萸的典故？

3.清劉銘傳經營臺灣時，曾築臺北至基隆間鐵路，中某隧道長11鎖70結，是現今多少長度？

4.碑文上有「林鍾月」的記載，林鍾月係指何月？

5.是否有醫師宣誓公約？

踏破鐵鞋無覓處?!解惑在頁41

參·考·小·檔·案·?!·

參閱
考覽
室組

於人類如何調適傳統與未來，應有重大啟發。

附註

- 雷叔雲小姐係本館編目組西編股前任股長。
- Raymond DeBuse, "So that's a book... advancing technology and the libra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7:1 (March 1988), pp.9-15.
- Katie Blake, "The electronic book" *Library HI TECH* 6:1 (1988), pp.7-11.
- San Jose Mercury News* (Oct. 13, 1988), Sect. 1A-2A.
- John W. Verity and Karen A. Frenkel, "Will Next usher in the software of the future?" *Business Week* (Oct. 24, 1988), p.78.
- Raymond DeBuse*, op. cit., pp.17-18.

中央圖書館往事環憶

蘇瑩輝

國立故宮博物院顧問

一、重慶時期

我入國立中央圖書館服務是在民國31年(西元1942年)的4月初旬，當我持立齋張先生的介函往重慶兩浮支路中圖重慶新厦晉謁館長蔣慰堂先生之時，承他接見，垂詢我的學歷和志學興趣以後，隨即將任用手令交給我於第三天(好像是兒童節的次日)持往白沙總館報到。他並囑咐：「你到白沙後，先將此紙交給特藏組主持人屈翼鵬先生，他會帶你向人事室辦理報到手續以及住宿等事宜。」我辭出後，經向渝館同仁探詢，才知道「白沙」是東川江津縣的屬鎮；而它還在江津的上游，隔日均有西上的小輪船停靠。我至白沙總館報到後，就派在特藏組工作，那時本組連組主任和我與樊漱圃先生共三人，稍後，才來了一位比我還年輕的李思恭君。屈先生早年服務於山東省立圖書館的善本部，那時館長王獻唐先生為著名的金石學家，也是先君的神交友之一。屈主任知道吾家收藏漢、魏碑拓和名家印譜之外，還有歷代泉幣百餘事，遂叫我負責館藏金石拓片的編目和考訂工作，遇到疑難的問題，就向他請示解決。漱圃先生曾在樂山復性書院從山長馬一浮問業，不但精研理學，尤擅詩古文辭，他住杭郡時，常與父執葉葉舟丈(諱銘)過從，因讀葉撰「廣印人傳」，知先君兼事金石傳真畫，故蒙贈詩有「印人一傳已千秋」之句，凡此皆令我至今感念不忘。

我在中圖白沙總館工作不足一年，於31年冬便奉派調往渝館協辦教育部主持之「三全美展」籌委會工作。教部主辦第三屆全國美術展覽會事，遠在民國26年6月即已定案，嗣因抗日戰爭而中止，直到31年12月始假中圖渝館大展覽廳為會場，開始展出，展品計分11類。蔣館長為籌委會常務委員，並兼第三組(主管展品登記、發還等事宜)主任，但他因館務繁忙，有時且在白沙辦公，除了籌委會開常委會議外，經常的組內事務，皆由我代為料理，因此，我和常書鴻(第一組)、徐伯璞(代表劉司長董理二組事務)、李瑞年(第四組)三位主任接觸的機會較多，也因此而認識多位美術家，後來我應聘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考古組的研究員，實亦肇因於此。當我在敦所聘約屆滿時，本應

回渝復職，奈蘭州的國立西北圖書館創設伊始，館長劉國鈞先生商得蔣館長同意，以借調方式於33年8月起，留我在蘭州待了8個月，為該館編審「西北文化」周刊，34年秋，經天水、成都返渝復職。居未久，即偕中圖首批同仁乘輪東下，還都參與圖書清點接收工作，是項清點結束後，我當然恢復在特藏組的任務，此時白沙的善本書，尚未運京。而戰時在滬收購的部分善本，仍存上海鄭西諦處，在民36(1949年)徐、蚌棄守前，我曾奉蔣館長特派三度由京乘「錢塘號」頭等特快車(行李、箱籠均可隨身攜帶)赴滬，提取鄭宅存書，有時須停留一、二日，等候西諦先生將書檢出，陸續點交，方能回京報命，雖每次攜回之數量不多(有時每部書中，只能檢出一、二冊帶歸京館)，固已視同拱璧，而回程在護運珍籍車廂中，其戒懼心情，及今思之，猶有餘悸！

二、遷館來臺

當徐、蚌吃緊，首都感受威脅之際，政府為使國家文化資產安全起見，決將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古物及中央圖書館之善本圖書聯合遷運臺灣，原擬分四批運完，結果未批未能運出。我和中圖的昌彼得先生、任闇女士均負責護運善本圖書，同於37年尾參與第二批(和兩院一所文物、同仁同船)專輪離京，翌年元月抵達基隆港，然後接駁臺鐵列車數節，轉運臺中安頓。而全體護運人員則皆暫住入中市合作旅舍。直至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館館聯合管理處成立後，我等押運同仁始分別納入聯管處新編制的故博、中博、中圖等組(均直隸教育部)，而古物、圖書則安置於新建庫房中。在中圖第一批及第二批善本裝箱竣事後，蔣館長俱蒞臨下關碼頭，親送我等上船，那時他因精善本圖書皆已運出，遂另乘商船赴臺。稍後，發表特藏組主任屈翼鵬先生為臺灣辦事處主任，為示禮遇起見，請屈主任另乘商船，毋須隨船押運，事後館座似有悔意，因非隨船押運者即不便納入院館押運人員合組之單位，同時翼鵬先生已應臺灣大學傅校長聘約，並無意繼居臺中，故院館聯管處成立後，便改派顧華先生為中圖組主任。

43年張曉峯先生就任教育部長後，除先恢復國立政治